

論壇版是一個公開的評論園地，歡迎社會各界人士與專家學者來稿。本版文章不代表本報立場。為增公信力，文章宜署真實姓名及身份。刊出概奉薄酬。來稿可用下列方法：郵寄：香港香港仔田灣海旁道7號興偉中心2-4樓《文匯報論壇版》 傳真：28731007 電郵：opinion@wenweipo.com

建邊境購物城 妙解水貨問題

劉斯路 資深評論員

東張西望

在邊境附近設立購物城，相信對奶粉水貨問題可收治本之效，甚至可考慮與新界東北發展結合起來，一來可令鄰近地區興旺，在該區創造更多就業；二來旅客可以在市區旅遊完畢，在離港前在邊境購物城盡情購物，疏導市區過多旅客購物的情況；三來邊境購物城可劃出特定區域予水貨客作交易集散地，到時水貨客自然全都轉移陣地，是一個三贏之法。

近期各大媒體的關注焦點都是內地人搶奶粉、水貨客攻陷本港各區、港嬰缺糧等報道，並再次把火頭扯到與兩地矛盾進一步惡化作討論，將一個經濟利益議題，演變為兩地矛盾問題。當中誰是誰非？政府應如何妥善處理？

水貨客問題與貧窮問題有關

要探究解決水貨客問題，先要解構到底誰人當水貨客？有調查指水貨客當中有內地人及港人，港人比例更高達六成，即是當中四成是以自由行或一簽多行入境的內地人。而港人水貨客當中不少是貧窮長者、失業青年及低收入人士等，都是香港收入較低的基層。從人性角度看，他們不是偷呢拐騙、殺人放火之徒，只是一群靠自己的雙手及汗水辛勞去掙錢，沒什麼不對。的確水貨客充斥水上等火車站，導致當地

居民出入極度不便，也影響香港市容。但港人水貨客問題反映出香港目前社會的核心問題：貧窮老人老無所依、青年雙失難就業，上游能力差、就業人士收入低迫不上通脹等問題。試想想，有正常工作、收入穩定的人又怎會一天走幾轉，提着沉重的貨品穿梭兩地，為了幾十至百多元酬勞而奔波。

貧富懸殊一直是香港社會問題，香港社聯數據指本港2012年上半年的貧窮人口達118萬7千人，較前年增加3萬多人，即是6個港人中，就有一人窮人。長者貧窮人口創10年新高，首次衝破30萬關口，達30.5萬人，貧窮率為33%，即平均3個長者中，就有一人處於貧窮狀態。而兒童的貧窮率為22%，青年及中年群組貧窮率有改善，但仍有惡化趨勢。另外，在職貧窮人口亦較前年增加1.5萬戶至20萬戶，當中一半家庭須供養兒童及長者。而貧富差距亦創10年新高，高收入住

戶與低收入住戶的入息中位數相差3.6倍。雖然政府指今年內會制定貧窮線，但沒有具體的扶貧措施，就算有貧窮線也是毫無用處。解決問題要從根源入手，香港政府要先解決老無所依，青年人教育及就業、居住環境改善、公共醫療資源等問題，確確實實讓更多的低收入港人能夠脫貧，改善生活環境，這才是解決香港人當水貨客的關鍵。

限制自由有違香港核心價值

解決內地人水貨客，不是撤銷一簽多行，限制自由來港就可以，香港零售服務業及旅遊業，若不是靠內地旅客所帶動，早已難以經營。自由行實施快十年，至今內地旅客為香港帶來逾萬億元收益、當中所帶動的經濟收益巨大，增加多個行業的就業機會。旅遊局指出，2012年訪港旅客超過4,861萬人次，較2011年上升16%，當中近3,500萬人次為內地旅客，比2011年急增24%。若為阻止近4千萬內地旅客入境購物，或水貨客搶購日常用品，而限制他們的出入境自由，撤銷一簽多行，這不單影響香港自由市場的國際形象，甚至打破香港一直引以為傲的人權自由的核心價值，這不是香港自由的大倒退嗎？

設邊境購物城三贏之舉

近日為解決本港部分地區出現的奶粉荒。有建議將奶粉列為香港的法定儲備商品，這也是治標不治本之法，法定儲備商品只能限制某些列入儲備名單的貨品出境，就算今天將奶粉列入名單之中，解決了燃眉之急，紓市民之憤，那麼明天難道又要將益力多、尿片、金沙等日常生活用品一件一件列入法定儲備商品中？其實奶粉荒最大元兇是奶粉供應商及各銷售商中有不法商戶囤積居奇、抬價，甚至故意不賣給港人，也有內地人五、六百元買罐奶粉。政府應再積極或用法律手段迫使供應商加大供應及改善銷售手法，密切監督各銷售商要依法銷售，必要時須殺一儆百，這樣才能有效阻嚇不法商戶。

其實香港可參考外國做法，在邊境附近設立購物城，相信這可收治本之效，甚至可考慮與新界東北發展結合起來，一來可令鄰近地區興旺，也可在該區創造更多就業；二來旅客可以在市區旅遊完畢，在離港前在邊境購物城盡情購物，集中購買心儀貨品，疏導市區過多旅客購物的情況；三來邊境購物城可劃出特定區域予水貨客作交易集散地，到時水貨客自然全都轉移陣地。試想若政府拍板，相信政界、商界及坊間反對意見必定少，這是一個三贏之法。

公民教育不能取代國民教育

桂松 資深教育工作者

反國教分子藉反對國教而否定國教。他們對國教作了許多歪曲和醜化，誤導了不少人。有些教育界人士受到影響，對推行國教產生疑慮，甚至懷疑原已實行多年且行之有效的國教方式、方法帶有洗腦性質，要重新檢視。

教育局被迫擱置《德育及國民教育課程指引》之後，有人主張將國民教育納入公民教育中，作為公民教育的一個部分，亦有教育界人士認為香港模式的德育、國民及公民教育的主要目標應該是公民素質的培養，包括相關知識、技能、態度、價值和品格，並以公民價值為主軸，建基本本地社會共識和國際普世標準，根據學生的道德發展階段，逐步引導他們學習多元價值，在不同的生活情景中作出道德判斷，反思個人實踐，成為良好公民。

將國民教育「融入」公民教育中，莫非以後者取代前者，今後大家只講公民教育，不提國民教育，這是否適當？國民教育與公民教育有甚麼相同和相異之處？國教應否以培養公民素質為主要目標，以公民價值為主軸？

探討這些問題，不妨首先界定國民與公民的含義。國民指的是本國的人民。公民則指具有本國國籍，依照憲法或法律規定，享有權利和承擔義務的人。由此觀之，國民教育的主要範疇是有關本國的知識以及國人與國家的關係，主要目標是增強國人對本國的認識和感情。公民教育的主要範疇是有關公民的思想意識，包括公民的權利和義務、公民公德、公民的政治及社會參與等等。兩者的側面不同，但可以相互滲透。

香港回歸後，雖然公民教育有關國家部分的推介有所增加，但在整體上則側重於自由、民主、人權等價值觀念的推廣。部分學界人士着眼於香港的本土化和國際性，對香港與內地同呼吸共命運的血肉關係，對「一國兩制」應以「一國」為前提，對推行國民教育的重大意義和深遠影響認識不足。他們尊重「兩制」的差別，卻忽視「一國」的原則。他們對公民教育寄予厚望，對國民教育卻感到疑慮，他們雖然重視公民素質的培養，卻忽視了國民教育的「國家」元素。

國民教育之所以堅持推行，除了因為九七年前港英推行殖民地教育，港人（特別是青少年）的國家民族觀念有所削弱，因而需要「迎頭趕上」之外，還鑑於祖國的崛起，香港與內地的關係更趨密切，這是客觀現實，也是歷史潮流。前者不能迴避，後者不可阻擋。

國民教育與公民教育可以並行不悖，彼此並不存在誰取代誰的問題，只要處理得當，可以相輔相成，相得益彰。

日前台灣保釣船全家福號再度起航，攜媽祖像前往宜蘭縣「治下」之釣魚島。期間，遭日艦攔截並遭水炮攻擊，海巡署船艦所謂「奮力反擊」之餘，卻警告不遠處的大陸海監船「不得進入中華民國領海」，佔足了戲份。

台灣有關部門解釋，此舉是為了避免造成「兩岸共同保釣」之印象，著實令人啼噓，不由得想起蔣公那句著名的「攘外必先安內」。此內，可有兩層，小內與大內。小內，為台灣內部。其一，保釣在台灣內部缺乏共識，特別在青年人群體中缺乏關注與熱度，保釣主力仍是70、80年代活躍的熱血「青年」。其二，國民黨內部缺乏強力整合，面對來自綠營的壓力亦常自縛手腳，雖當局曾有「不惜一戰」的高調表述，但象徵意味頗濃，鮮有應對政策與手段。

大內，則是包含兩岸的大中華之內。去年以來，隨着日本「國有化」釣魚島，保釣運動的主導權悄然發生了轉移。大陸政府一改慣有的冷處理，以前所未有之強硬姿態強勢介入釣魚島事端，大規模派遣海監艦艇，甚至出動飛機巡航。相比之下，台灣部分政客視大陸之舉動為「侵犯台灣主權」、「造成台灣屬於中國之假象」而橫加抵制，台受制於「先經後政」乃至「已經不政」緊箍咒，不敢同大陸合作，以避免授人「親共賣台」之口實。同時，台日美特殊之軍事合作（如情報交換）與微妙的三邊關係使台灣成為保釣的潛在障礙，亦給大陸政府出了難題：倘若大陸政府對釣魚島實際控制進一步加強，是將控制權交予台政府、與台分享，還是如何？2016年台灣若再次政權更迭，對大陸的釣魚島控制持敵意態度，大陸又該如何避免將台灣推向日本？釣魚島之癆，核心不在中日，而在兩岸。

20世紀30年代，國共內戰，中華不安，國土遭蠶。終西安事變，國共二次合作，共拯國難。時過境遷，兩岸隔閡，釣魚島落淚。內雖不安，攘外不可言棄。何不換個思維，從互不干涉做起，逐步建立保釣的默契？

徐淵 香港大中華評論學會

兩岸保釣須擺脫「攘外必先安內」之困

章剛

自留地

目前社會上各種雜音不少，有時確令青少年難以抉擇審察，因此，政府和有關人士確實要認真負起青少年導師的責任，做好青少年德育工作，不要和稀泥。

剛發表的《施政報告》中第「129」段「青年發展」中有200字的工作計劃，希望能加以充實發揮認真實行，在青少年教育工作上取得主動，讓政府工作更全面和進行得更順暢、有着更堅實廣闊的基礎。

中共十八大後，中聯辦主任張曉明發表了《豐富「一國兩制」實踐》的文章，解讀了認識和實踐《基本法》的要點，特別是在這時刻對香港人和關心香港百業的人很有發聲振聵、激濁揚清的作用。在這啟發下，我在《論壇》發表了學習心得（2012年12月8日）《滋滋及時雨 昭昭指路燈》。此後不久，今年1月10日，張曉明春雷初綻，在青年論壇上對香港青少年嘉言勉勵，恍如在百川競流的濁水中劃出一條正確的航向，導引着漫漶的思潮找到正確的依歸。他向青少年指出要「識大勢、明大義、講大局」，明確了方向，端正了態度，闡清了承擔。這番講話是及時而且具正能量的。隔了數天，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喬曉陽在深圳會見新一屆港區區人大代表時表示：中央非常關注香港青少年工作，留意到香港青少年中有少數人對「中國人」、「殖民統治歷史」、「國民教育」、「祖國歷史和狀況」等等課題都認識不足甚至誤解，因此呼籲區人大代表要協同政府做好對青少年的工作。張曉明和喬曉陽短時期內發表了類似的重點談話，並不簡單，必有涵義：說明了當今香港青少年問題和

教育工作的重要性。

青少年要「識大勢明大義講大局」

我們國家一貫以來就非常重視青少年工作，他們是社會建設中一支最敏感、最活躍，也是很重要的力量。把青少年工作做好，可以培養出人才，也可以為社會輸入正能量，試看我們新一屆的中央以及基層的領導者，不少是在人民群眾中歷經過考驗和具有青少年工作經驗的良材，因此，他們都深刻地認識到青少年工作的重要性並擁有青少年工作的實戰經驗。

香港有些青少年看不到祖國的發展和成績，以為美國可以統治世界，依附着美國就可以穩坐在自由和人權的安樂椅上，昏昏然不知天下大事，聽從着某些人的鼓動和催眠，羽翼未豐的黃口小兒就跟着某些人的指揮棒瞎嚷嚷，沒受過帝國主義和殖民地政府欺騙的青少年竟然揮舞着外國旗幟叫囂「鴉片戰爭勝利萬歲」，在代表着中央政府的權力機構門前焚燒國旗和豎起外國旗。

回到港英年代是倒行逆施

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香港曾經歷殖

民統治的老人尚有不少，請向他們一問港英時代歲月如何；再遠一點，請看上世紀三十年代我國被列強欺侮的日子，尊敬的老舍先生曾經在英國倫敦生活過一段時間，他以親身的體驗寫進《二馬》中去：「普通的英國人全咧着嘴笑我們，因為我們的陸海軍不成。……我父親那一輩的中國人是被外國人打怕了。」那時在中國傳教的殖民統治煽客有這樣的心態：「中國人不叫英國人管起來，這群黃臉黑頭髮的東西，怎麼也升不了天堂！」現在香港這群叫囂着要回到殖民地歲月的人，不就是和這些煽客有着同樣語言？因此，愛國的知識分子如老舍者就如此呼籲：「中國人！你們該睜開眼看一看了，到了該睜眼的時候了！你們該挺挺腰板了，到了挺腰板的時候了！——除非你們願意永遠當狗！」八十多年前這位曾經被諾貝爾文學獎選委員會看中了的大作家就曾這樣說過，這些話到現在還應該在耳邊迴響。

與祖國同胞共同建設幸福家園

今日香港的青少年正應該用他們敏銳的觸覺和旺盛的精力去高舉反帝反殖反霸權的大旗，和祖國同胞一起走上建設自己幸福前途和家園的大道。我們是重道義的國家和民族，一貫以來遵循着傳統的春秋大義，並不以孔夫子和他的弟子之歿而失傳，中國人民一貫堅持明辨是非、正邪、善惡和褒貶，清楚認識敵友；一貫以來廣泛地團結絕大多數的人民，正是：「謀度於義者必得，事因於民者必成」（《晏子春秋·內篇》），我們深信正義的為民謀福祉的事業一定會勝利。

俞曉秋

中美關係會向何處去

美國亞太戰略新舉動，在策略上與冷戰時期對付前蘇聯有相似的一面，但最大不同之處有三：一是市場經濟、經濟全球化和信息化，使中美已形成功能互補、互有所求的關係，兩國都難靠一己之力或組建集團同盟去解決自己和世界的問題；二是冷戰時期是美蘇兩大國、北約華約兩大集團、東西方兩大陣營在地區和全球範圍的爭奪和對峙；三是美國應對朝鮮、伊朗核問題等，需要中國的參與、調停和協助。

兩國戰略變化與思維是前提

在美國一些精英看來，中國向世界開放、追求發展強大，其進程實際上是向美國和西方「看齊」，勢必與美國在全球範圍內爭奪資源、能源、市場和影響力，也勢必促使一些有利美國和西方利益的國際秩序和規則必須改變。這種思維在美國外交、軍事和戰略界中根深蒂固，並居上流就是，洗刷近代百年來受外國列強殖民侵略的歷史恥辱，徹底改變落後窮困的社會面貌，建成一個富強、文明、民主、統一的現

代化國家。為了實現這個目標，中國需要一個和平穩定的地區與國際環境，長期奉行的和平、發展與合作的對外戰略是穩定的，維護國家獨立、主權、領土完整與安全的核心利益是堅定的，不搞對抗、不稱霸的立場是真切的。

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國力得到大大增強。儘管如此，中國對外戰略追求的主要目標仍然是發展、穩定、安全、統一和應有的尊重與相應的國際地位，而不是挑戰美國謀求世界霸權。換言之，中國對外戰略的目標有四個層面，即經濟發展與政治、社會穩定；國家主權、安全、統一和領土完整；和平穩定的亞太周邊地區環境與睦鄰友好合作；參與國際事務與多邊合作，維護自身的國際利益和提升國際地位與影響力。中美關係是中國對外最重要的雙邊關係。中國強調「五個堅持」，冀望與美國建立「相互尊重、互利共贏的合作夥伴關係」和共同探索構建二十一世紀的「新型大國關係」。

中美關係仍將經受磨練

奧巴馬第二任期將提名前參議員約翰·克里接替希拉里出任新政府國務卿。儘管克里被認為是「溫和派」、「務實派」和較為了解中國的，但他的對華態度和政策將取決於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可以預料，克里會承襲奧巴馬-希拉里的對華政策框架、要旨和經驗。中美之間有着共同的利益自不待言，但分歧和矛盾愈益鮮明，無法規避和繞彎。在奧巴馬未來4年任內，中美關係仍會發生磕碰和出現起伏。

首先，面對經濟復甦的困境，奧巴馬實行貿易保護主義傾向和做法非常明顯，中美經貿爭端會首當其衝。美國還會就人民幣匯率問題指責中國

「操縱匯率」。針對美國續推「量化寬鬆」、大量印發美鈔，中國會強烈要求美國確保中國在美資產的安全、不受損害。其次，美國將繼續推進其「重返亞太」和「再平衡」戰略，推動美主導的《泛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定》(TPP)，軍事上將反導防禦系統引入亞太、部署X-band和C-band雷達、向盟國出售先進武器等，不可避免會加劇相互的猜忌和不信任感。再次，兩國在經貿領域關係惡化對兩國都不利。因而，美國會在人權、民主、西藏、宗教與網絡自由等「軟問題」上更嚴厲指責中國，拋出一些措施，干預中國內部事務。中美雙方在這些問題上的爭執會突出。此外，美國會在太空、網絡及通訊等新領域、新議題上對中國施壓，「設門檻」、「定規矩」。最後，雖然決定和影響中美關係好壞，主要取決於雙邊關係上相互分歧矛盾與共同利益及合作有多少的程度，但也受到「第三方因素」的影響。以前是「台灣因素」，當然是中日釣魚島之爭等。美國採取怎樣的態度和做法將直接影響雙邊關係的好壞。

儘管如此，由於兩國關係從正常化至今經過了30多年的碰撞、摩擦，已經形成首腦熱線、高層互訪、戰略對話、聯委會、軍事交流等多種方式和途徑的有效機制。中美在亞太與國際事務上也離不開彼此的磋商與合作。因此，雙方能夠通過及時對話、溝通、協商和談判，通過彼此權衡利害得失以防止戰略與政策誤判來「管控分歧」，使兩國關係保持基本穩定，避免失控而導致發生全面的對抗和衝突。在確保兩國關係基本穩定的前提下，力求相互適應，並積極探索和規劃中美關係未來發展的「路線圖」。（原載《鏡報》2013年2月號，本報有刪節。）